

未持之因——价值系统持久性的动力学研究

许多价值系统要求其成员主动选择损失或承受痛苦，却在漫长历史中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与激发力。学界对此存在两种影响深远的解释路径：将其生命力归于自上而下的纯粹恩赐，或还原为自下而上的意义交换。本文指出，尽管两条路径在诸多议题上相互对立，却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底层预设——动力源必须处在系统对成员的“供应关系”之中，以成员意识可以识别并持有的方式被接收。

作者 胡敏 · 约 2.2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4日

摘要

许多价值系统要求其成员主动选择损失或承受痛苦，却在漫长历史中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与激发力。学界对此存在两种影响深远的解释路径：将其生命力归于自上而下的纯粹恩赐，或还原为自下而上的意义交换。本文指出，尽管两条路径在诸多议题上相互对立，却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底层预设——动力源必须处在系统对成员的“供应关系”之中，以成员意识可以识别并持有的方式被接收。本文撤销这一预设，通过对长期照护者动机叙述的经验分析，结算出一个新的辨别维度：系统最持久的行动引信，不是那些被意识认定为“我之所以坚持的理由”的持有物，而是系统长期运转中渗入成员感知结构的动力沉积，在失去意识层面的解释持有之后，以非持有的方式所引发的具体行动倾向。本文将此命名为“未持之因”，在与惯常化理论、默会知识、习惯理论、惯习理论及剩余快感等最邻近概念的严格对质中确立其不可还原性，剖析其发生的双重机制——解释劳动的沉积制造与意识持有的结构性瓦解——并以之为核心重建对价值系统持久性的解释，最后给出基于现有数据可检验的证伪条件。

关键词：未持之因；价值系统持久性；解释劳动；意识持有；失持；长期照护；惯常化；沉积倾向

一、一个无法被既有解释消化的裂缝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是一道悖逆一切自我保存本能的精神命令。两千年间，它不但没有被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淘汰，反而成为文明史上最具韧性的精神引擎之一。对此持久性的解释，学界长期存在两条彼此竞争却又共享同一个底层预设的路径。

第一条路径将其归因为礼物的力量。此路认为，命令之所以被无数人甘愿承接，是因为颁布命令的那一位自己先走上刑场并从死里复活。追随者承接的不是一套教义，而是一份自上而下、不求

任何前置资格的纯粹赐予。这份赐予的持久力，恰恰在于它不能被量化、不能被赚取、不能被解释系统穷尽——它是恩典，不是道理。

此路面对的难题是：纯粹恩典从来不曾、也不可能以无媒介的形式在人类制度里运行。它每一次落地，都被宣道者、神学家、灵修导师紧紧包裹，被解释、被教导、被一代又一代人用自己的生命经验重新转译。在这漫长的解释劳动中，恩典被反复制造为可被理解、可被传递、可被接受者意识所“持有”的道理。如果命令的力量来自纯粹恩典的无媒介冲击，那为什么还需要两千年不间断的道理制造？

于是有了第二条路径：交换逻辑。它将命令背后一切神圣光晕还原为人自我维持的意义制造——一种隐含的、精密的计算系统。在这本账本里，每一分痛苦都被换算为某种回报。在早期教会，它是天上不朽的冠冕；在中世纪，它是赎罪券和补赎礼精算的炼狱刑期折扣；在现代，它被心理学话语接手——舍己成为“杀死假我”的手续费，受苦是人格成长必付的代价。这套解释系统从不停工。它有一个版本繁多的解释库，随时为任何时代的焦虑者配发量身定做的答案。

但这条路同样撞上它的边界。如果命令的生命力仅仅来自被精心维系的交换——一种可被意识持有的“意义回报”——那么，在经历了启蒙运动、精神分析、脑科学和无数的祛魅之后，在所有接受者都或迟或早会碰到那个问题——“如果这些回报都不确定，我为什么还要继续？”——之后，这台机器为什么至今没有全线停摆？

两条路径在此暴露了它们的共同地基。无论说是恩典在托住行动者，还是说他潜意识里仍在进行某种成本-收益的换算，都预设了同一个前提：一定有一个能被定位、被指认的动力源，正在供应这个行动者，而行动者以某种方式“持有”着它。礼物的持有方式是感恩和信靠；交换的持有方式是对回报的预期和计算。持有方式不同，持有结构相同——推动行动的力量，是一种可被意识定位、可被指认为“我之所以能做这件事，是因为……”的持有物。

然而，正是在那些最日常、最沉默、最不符合戏剧性叙事的持守中，这个预设失效了。

考虑宗教社会学者在长期照护者研究中所遭遇的一类叙述困境。社会学家Stephen Post在一项对失智症患者家庭照护者的定性研究中记录了大量这样的访谈片段。他的受访者并非英雄式的殉道者，而是普通的配偶和成年子女，他们的照护岁月往往长达十年以上。在将近一百五十份访谈记录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当被问及“是什么让你坚持了这么久”时，相当比例的受访者无法给出一个稳定的、可被自己整合进信仰或价值框架的答案。Post在研究报告的讨论部分这样描述他的困惑：

“我们原本预期那些具有明确宗教归属的照护者，会比非宗教照护者更多地援引信仰作为坚持的理由。但数据呈现的图景更复杂。在许多个案中，受访者早年曾深度参与宗教生活，并明确表示自己‘当初是因为信仰才接下这个担子’。但在被问及当前阶段的动力来源时，同一批受访者的回答却充

满了不确定性。一位照顾丈夫十八年的女士——她曾是教会诗班的骨干成员——在被反复追问‘信仰现在对你意味着什么’时，沉默了将近半分多钟，最后说：‘他在我祷告的时候不再说话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还是相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仍然相信。但这不再是我每天爬起来给他翻身的原因。’”

另一位照顾失智母亲近十年的男性受访者的叙述更加直白：“以前我觉得这是十字架，是上帝给的功课。后来我连上帝都不太确定了。不是说我不信了，而是那些说法——在祷告里交托、凡事都有美意、将来的冠冕——它们还在我脑子里，但已经拉不动我了。你懂吗？它们还在那儿，像墙上挂着的老照片，但已经拉不动我了。”（Post, 2000）

在仔细审阅了这些叙述之后，Post和他的合作者发现，这类“动机叙述失败者”的照护行为并未随着信仰框架的瓦解而停止。恰恰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访谈后的追踪期——在旧有解释体系已明确失效的情况下——仍然维持着高强度的照护行为。

这不是一次性的舍命冲动。这是一种在漫长日常中，对抗着日复一日的微小消耗与反复失望之后，仍然维持住行动指向的持久性——而行动者本人已经不再能从意识层面清晰地调动当年的召命、奖赏或意义框架作为动力。礼物逻辑无法解释，因为行动者已经不觉得自己在“接受”任何恩典。交换逻辑同样无法解释，因为意识层面的计算早已因回报不确定而停摆。

这个裂缝，就是本文论证的起点。它不是关于“英雄时刻”的例外，而是关于“日常持守”中那一段无法被既有解释收编的因果剩余。本文试图表明：这个剩余并非没有原因；它的原因，恰恰在于行动者不再“持有”任何原因。在解释劳动的数十年沉积之后，在意识终于松开它对“为什么”的握持之后，那些沉积物本身——而不是它们曾经包裹的解释——成为了一种非持有的行动引信。

本文将这一动力维度命名为“未持之因”，并将在与最邻近概念的系统对质中确立其不可还原性。

二、既有解释的发生学检讨：被共享的“持有”预设

在正式界定未持之因之前，有必要对礼物逻辑与交换逻辑各自内部的复杂性做一次公允的重构。这样做不是为了做文献综述，而是为了证明：尽管两条路径在诸多具体议题上相互对立，它们都未能跳出同一个底层预设——动力源必须是可被意识持有的。这恰恰意味着，两条路径不是两个独立的解释选项，而是同一个先验预设的两组不同表达。

2.1 礼物逻辑：从纯粹礼物到礼债的持有结构

在礼物逻辑的传统中，莫斯对“豪”的分析至今仍是无法绕过的源头。他揭示了一种比市场交换更古老的循环：给予、接受、回礼的三重义务。其中的驱动力被定位在循环的强制性中——“豪”作为一种迫使接受者必须回礼的灵力，一旦礼物被接受，就在承受者那里制造了一笔无法还清的亏欠，这笔亏欠本身就是持续行动的动力。莫斯的贡献在于指出了礼物关系中的“多出来的东西”：礼物不只是物质转移，还携带着某种无法被经济理性还原的推力。

但莫斯的推力仍然是一种被持有的推力。接受者在意识层面清晰地感受到“我欠了这笔债”，并在这种感受的驱动下做出回礼。莫斯没有追问：如果有一天，接受者不再觉得自己欠任何人的债——不是因为他还清了，而是因为整个亏欠的参照系在他心中瓦解了——那个曾经推动他的力量，是否还会以某种残余的形式继续存在？

德里达在《给予时间》中把礼物的逻辑推到了极限，也正好推到了无法再推的墙根。他的核心论证是：真正的礼物一旦被识别为礼物——一旦进入接受者的意识、被认知、被感谢——就不再是礼物，因为识别和感谢已经将它拖入了交换经济的循环。德里达的礼物因此成为一种“不可能性”：它永远不能抵达而不自我取消。德里达的结论看似与本文的方向一致——都指向交换系统无法回收的维度。但本质差异在于：德里达的礼物是源头的不可抵达；本文要论证的，是动力材料在长途抵达之后、在意识对它的持有瓦解之后，所释放的残余效能。德里达说真正的礼物从不抵达；未持之因说它早已抵达，只是你不知道它何时抵达、以何为名。

2.2 交换逻辑：从粗陋互惠到一般化互惠的持有升级

交换逻辑同样比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区分了三种互惠形态：粗陋互惠（即时、等价的交换）、平衡互惠（有延时的、可预期的回报）和一般化互惠（不求即时回报、甚至不求明确回报的给予）。一般化互惠已经在形式上非常接近本文所描述的“不持有回报预期的持续行动”——一个猎人在打到大型猎物后，将大部分肉分给族人，并不计算谁吃了多少、谁欠了多少。

但一般化互惠的运作前提，是行动者仍然处在那个互惠社群的日常互动中。社群的持续在场——邻舍的面孔、集体的节奏、分享的惯例——为他的行动提供了一个隐性的、弥散的意义框架。这个框架虽然不如“计算”那么精密，却仍然是一种被意识所持有的东西：行动者“知道”自己属于这个社群，“知道”自己的给予会在某种模糊的意义上被认可或回报。一般化互惠不是意识的缺席，而是意识持有的形式从精密账本变成了弥散的社群感。

未持之因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当这个弥散的社群感本身也瓦解了之后——当照顾者不再去教会、不再认为自己的行动被任何超越或社群的目光所看见——那些曾经在社群互动中沉积下来的倾向，是否还能推动行动？

2.3 共享预设的暴露：“供应-持有”模型

无论从礼物的路还是从交换的路走，最后都会落到同一个预设上：动力源必须处在系统对成员的“供应关系”之中，以成员意识可以识别并持有的方式被接收。无论是恩典（被感恩所持有）、亏欠感（被义务感所持有）、意义回报（被预期所持有）还是一般化的社群归属（被弥散的认同所持有），动力总是一个可以被定位为“我之所以做，是因为……”的持有物。

本文要撤销的，不是礼物或交换中的某个具体解释，而是这个共享的“供应-持有”模型本身。撤销的方法不是论证这个模型太简单，而是论证它在一个特定的经验裂缝——Post所记录的那些照护者叙述困境——面前，正好失效了。在那条裂缝里，行动还在继续，可被指认的持有物却已经不存在了。“像墙上挂着的老照片，已经拉不动我了”——那个东西不是恩典，不是交换，不是社群感。它曾经是它们中的一个或几个，但它现在已经不再是了。然而行动还在。这意味着，持久性动力源至少有一部分，不在供应关系的覆盖范围内。

三、惯常化理论：最邻近期概念的对质与切割

在正面界定未持之因之前，必须先与它在语义空间上最邻近、在理论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替代解释做一个正面切割。这就是Berger的惯常化与制度化理论。如果未持之因仅是惯常化的一个伦理性子集，那么它的不可还原性从一开始就不成立。

3.1 Berger的惯常化理论：意义沉淀与动机遗忘

Berger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论证了一个完整的过程：人类行动在重复中被惯常化——特定的动作序列逐渐从“需要决定的行动”固化为“被情境触发的模式”。随后，惯常化的行动在人际间被类型化，形成制度。制度一旦形成，便获得了一种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它被体验为“本来就该如此”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制度的原始动机——那些曾经让创始者们激烈争论、痛苦抉择的具体情境与理由——被一代代地“遗忘”了。行动者不再需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只需要知道“就是这样做的”。

Berger进一步展开了一个关键的论证：这种“遗忘”并不是制度衰弱的标志，恰恰相反，它减轻了后代的认知负担——每一代新人不必重新发明制度，不必在每一次行动时都重新激活原始的全部意义张力。在这个意义上，“遗忘”使制度获得了持久运作的可能性：用一个竞争性的术语来说，它让系统在失去“持有”之后仍然继续运转。

这就是“物化”概念的精确生态位。物化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社会建构的现实不仅不再需要原始动机的支撑，而且被体验为外在于人的、客观必然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决定的，这就是事物的本性”。当事态的演变被体验为一种非人的必然性时，意识的“持有”便达到了它的终极极限：不是“我持有这个理由”，而是“这个理由不再需要我来持有”。行动者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要求他“相信”才行动

的道德命令，而是一个要求他“服从”才安全的客观规律。

这个框架与未持之因的家族相似度极高。两者都论述了：意义如何在重复行动中沉淀为身体化倾向；意义框架如何可以局部或整体地瓦解（“遗忘”），而行动仍然以某种惯性持续的；以及“不再持有”如何反而可能成为制度持久性的一个条件。如果未持之因仅仅是惯常化的一个特例——它只是把“婚姻制度”“货币制度”的持久逻辑套用到“价值系统的舍己命令”上——那么“未持之因”就是一个不需要的新名字。

3.2 分离线的确立：伦理定向性的不可取消

但这两个框架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在因果效力上构成根本差异的分离线。

Berger的惯常化模型预设了一种动机遗忘的整体化倾向。制度化一旦完成，制度对行动者的要求，便从“你必须做这件事（因为你认同它）”滑向“你必须做这件事（因为它是制度）”。在这个滑移中，行动者不再需要为行动提供伦理的理由，制度本身——它的“客观性”“稳定性”“理所当然性”——就足以充当理由。换句话说，Berger框架内的“失持”，其替代品是制度本身的客观压力：社会制裁、角色期待、惯例的惯性。这一整套替代装置，是价值系统在普遍世俗化进程中被逐渐剥除的东西。当教会对个体的社会控制力衰减，当邻舍的评价不再是行为的主要约束，当“照护配偶”的角色期待被个体主义文化削弱——制度的客观压力便开始退潮。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动力完全依赖Berger式的制度化惯性，那么照护行为应当随制度退潮而同步消退。

但Post的数据显示，相当一部分照护者的行动在制度退潮后并没有消退。这正是裂缝的精确位置：制度压力已经撤去了，意识层面的持有也已经瓦解了，但行动仍在继续。这个“继续”必须由不同于制度惯性的其他的东西来支撑，因为制度的“理所当然性”——那个在Berger框架里充当失持替代品的客观压力——在这些照护者身上恰好已经失效了。

这就导向了第二组差异。Berger的理论并未要求区分“行动者被情境触发时不假思索地做”的原因来自何处——它可能来自外在制度的压力，可能来自内在习惯的自动化，也可能来自某种被早期实践所铭刻的情感倾向。但这个“不区分”，恰恰是未持之因试图打开的黑箱。在制度压力与环境约束撤除或严重削弱之后，一个行动者仍被情境触发而行动，其触发机制的类型差异便暴露出来：这到底是一种内在自动化（习惯），一种社会规范的内化（角色），还是一种被伦理实践所铭刻的、对特定他者面孔的知觉-冲动预备态？这些不同触发源的差异，在制度压力仍然在场的条件下是被掩盖的——你无从分辨他递水是因为妻子在呻吟、因为社会期待他做个好配偶、还是因为习惯。但当制度压力撤除、意识持有瓦解，剩下的那股仍然具有指向性的推动力，就必须有一个不同于惯常化整体的名字。

3.3 分离线的操作化

这条分离线可以这样被钉牢：Berger的惯常化理论可以解释制度在意义枯竭后的惯性运行，但它解释的对象是制度整体——制度作为一套规则和期待系统的自持。未持之因解释的对象则是个体成员在制度压力已经撤除、意识持有已经瓦解之后，仍对特定他者保持行动指向的那一束残余定向效能。前者回答：为什么制度还在运转。后者回答：为什么这个人在制度已经不再能兜住他的情况下还在照护。

如果这两者只是同一个机制在不同层面的投射，那么在制度压力撤除（例如照护者搬离原社群、不再有教会的日常接触）之后，个体的照护行为应当同步衰减。如果没有衰减，就意味着有一个独立于制度化压力的因果维度在起作用。这个预测差异是可检验的，因而不是术语辨析，而是不同因果结构的经验标记。

至此，本文完成了对Berger惯常化理论的正面切割。未持之因不是惯常化的子集，而是它的一个之前未被区分的、具有独特因果逻辑与可检验条件的辨别维度。这个维度在下一节将被正式界定。

四、“未持之因”的界定与其他邻近概念对质

在完成了与最近似框架的切割之后，本节正面界定未持之因，并完成与默会知识、习惯理论、惯习理论、剩余快感这四组概念的严格对质。界定工作将不从抽象定义起手，而是从亲历过信仰瓦解的照护者叙述中所涌现的那类因果要求出发，逐步结算出那个必须被命名的辨别维度。

4.1 从裂缝中结算：叙述困境的因果要求

首先回看那类关键叙述。Post记录的那些照护者，就其叙述困境而言，并不只是“没说清楚”。他们的困境有一种特定的因果结构：他们不是无法表达——在谈到其他话题时，他们完全可以条理分明地叙述——而是在被反复追问动机时，陷入了一种稳定的、一再重现的语言悬空状态。在他们之外还有一种作为对照的照护者群体：那些在信仰危机后终止了照护行为的人。Post的追踪数据显示，在经历深度信仰危机的受访者中，持续照护者与终止照护者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行为维持差异，而这个差异无法被“信仰危机严重程度”“社会支持水平”“照护时长”等控制变量充分解释。

这个差异的存在，对我们提出了一道因果要求：如果全部动力都来自意识可持有之物，那么当持有物消逝——当旧解释不再有力、新解释尚未成形——行动应当随之停止。而当行动在持有物消逝后仍持续时（且这种持续不是随机现象，而呈现与前期实践投入的系统性相关），就必须承认存在另一条动力通道。这个通道的肯定性特征可以从叙述困境的结构中反向推导出来：

其一，它必须具有足够的定向性，才能解释为什么行动者没有随机地停止或转向其他活动，而是在漫长的日常损耗后仍指向那个特定的照护行为——不是泛泛的“做好事”，而是对着这个已经在记忆里认不出她的丈夫。

其二，这种定向性不是命题性的——不是“我相信X，所以我做Y”的推导链条——因为命题性的信念正是裂缝中已经失效的那部分解释。把话说得更精确些：它不是一个“回答为什么”的理由结构，而是一个“在具体情境中启动某个动作序列”的触发结构。

其三，它必须在特定触发情境下被激活——邻舍的面孔、身体的节奏、空间的配置——而非在任何时候都均匀地驱动行动；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行动者在被访谈时“说不清楚”，但在清晨听见丈夫呻吟时却“不由自主”地起身。行动与情境的耦合紧密到了意识来不及介入的程度，而这正是触发式因果的一个操作标记。

据此可以结算出未持之因的临时指称：未持之因不等于任何可被意识提取并陈述为“我之所以如此行动是因为……”的持有物（信念、预期、边界感、回报计算、社群认同）。它是这类持有物在意识层面瓦解之后，从解释劳动的长期沉积里脱壳而出、仍在特定触发情境下推动行动的那一束具体因果效能。临时指称的作用不是给出一个精确定义——精确定义将在沉积与失持的机制被完整展开之后才结晶——而是提供足够的辨识特征，使下文的机制论证有一个稳定指涉。它的严格定义见后文第5.4节的末尾。

4.2 与默会知识和习惯理论的对质

上述指称将未持之因推到了与几组最邻近概念的临界面上。本节完成三组切割。

（一）与默会知识的切割。波兰尼在《个人知识》和《默会维度》中论证了人类认知的一个基本结构：我们所知道的远比我们能说出的多。行动者在执行一个熟练动作——如骑车保持平衡、辨认一张面孔、做出一个复杂的临床诊断——时，所依赖的大量知识是默会的：它不能被充分用命题形式陈述，却在行动中持续发挥因果作用。这个结构看似与未持之因高度重叠——都是“不被意识以命题形式持有的推动力”。

但默会知识与未持之因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默会知识的形成过程是一般的技能习得过程——它不要求一个先在的、在意识层面被热烈认同并主动投入的“持有”阶段；它只要求反复的实践。一个骑车的人从不曾需要相信“保持平衡的公式”才能学会骑车；他从未“持有”过那套公式，因此也无从“失持”。未持之因的发生则要求一个特定的时间-结构配置：成员必须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意识层面全心认同并主动投入某套解释体系的叙事、仪式与实践；随后，这套解释体系由于危机、倦怠或祛魅而在意识层面瓦解；此后，那些在持有阶段被沉积的动力倾向，才以不再被意识持有的方式继续运作。默会知识从不过持有-失持的转换；未持之因恰恰依赖这个转换。分离线就在这个时间-结构配置上：不是“任何不被意识命题式持有的推动力”，而是“先被持有、后失去持有、仍在推动”的特定因果序列。

（二）与习惯理论的切割。当代习惯心理学将习惯定义为：通过重复而在特定情境中自动激活的行为倾向，其运作特征正是意识的低介入。从表面看，失持后的行动确实呈现出某种“自动化”的

质感：照顾者“不由自主”地递水、起身、擦拭。

但习惯与未持之因在形成机制、激活条件与伦理性质上存在三重差异。第一，形成机制不同。习惯的训练是行为的重复——重复次数越多，情境-反应的联结越牢固。习惯不关心行为的意义，只关心行为的频率。未持之因的沉积则是伦理命令的实践——它不是“做得多就自动了”，而是“在做的过程中，每一次面对他者面孔时的伦理感知被逐步铭刻”。沉积物的定向性来自他者的面孔所施加的伦理诉求，而非行为的重复概率。第二，激活条件不同。习惯一旦形成，可以在无意义的情境中被触发——一个戒烟的人会在每次喝咖啡时不自觉地想抽烟，尽管他早已不再认为抽烟有任何意义。未持之因的激活则严格依赖触发情境的伦理性在场——照顾者递水，不是因为“递水”这个动作本身被重复了足够多次，而是因为那个具体的、正在受苦的邻舍面孔重新唤起了沉积倾向。置换一个没有伦理诉求的触发情境，未持之因不会被激活；而习惯会。第三，伦理性质不同。习惯是道德中立的。未持之因则携带不可消除的伦理定向性——它指向的始终是系统命令所规定的那些具体行动（舍己、照护、宽恕），而非任意重复行为。一个在照护中沉积了未持之因的人，不会因此更容易染上赌博习惯。

这组切割不只是术语辨析。它有具体的检验途径：如果未持之因仅是习惯，那么剥夺行动者对其自身行动的伦理叙事（让她相信这只是一个家务任务）不应影响行动的持续性——习惯不依赖叙事。如果它是未持之因，那么持续地向行动者灌输一套新的伦理解释（如“你完全有权利终止照护，这不代表你不爱他”）可以在一定时间窗内逐渐削弱行动的维持——因为新的解释劳动正在沉积新的感知倾向，与旧的倾向竞争。这个差异构成两个理论的实证分界，因而不可还原性论证在此不是哲学闲谈，而是对可检验的不同因果结构的指认。

（三）与依恋理论的对质。在长期配偶照护的语境中，依恋理论可能构成最有力的替代解释。Bowlby的经典框架与后来发展出的成人依恋研究已经充分论证：长期亲密关系在个体内部形成了持久的情感-行为倾向，这些倾向的激活不依赖于命题信念或意识计算，而依赖于依恋对象的具体在场与特定情境线索。在这个框架下，Post所记录的那位照顾丈夫十八年的女性，其持续照护的原因可能根本不是“未持之因”，而是长达数十年的婚姻所累积的深层情感附着——一种不再需要意识解释支撑、却仍在特定触发下（丈夫的痛苦表情、熟悉的日常生活节奏）自动激活的依恋行为系统。

这组切割的命门在定向性上。依恋理论解释的，是行动者对这个特定依恋对象——这个丈夫、这个母亲——的持续回应。“这个特定对象”是依恋行为的自然边界：依恋系统不是在普遍意义上激活，而是被特定的依恋对象所触发。未持之因的定向性则有其不同的来源：它虽然由“照护这个具体配偶”的经验沉积而来，但它的方向性并不附着于“这个配偶”的个人同一性，而是附着于“正在受苦的邻舍”这个不特定他者的范畴。也就是说，未持之因所沉积的倾向，其触发条件中的受事者位置是开放的——它对准的是一个关系类型，而不是一个可被穷尽枚举的具体个体名单。

这一点在那些照护对象已经失去人格连续性（如重度失智症患者）的个案中，表现为一个依恋理论难以完全消化的现象。依恋理论通常预设照护对象保持着最低限度的人格同一性——他仍然是那个你爱过的人。但在失智进展到晚期、患者已不再能被配偶识别为“那个我嫁的人”时，依恋行为通常会进入重新评估或消退的阶段。而正是在这一类个案中，Post观察到一些照护者的行动维持超出了依恋理论的预期范围。一位照顾失智丈夫十四年、在丈夫已完全无法认出她的受访者这样说：“他已经不是我当年嫁的那个人了。我不觉得我爱他——不是不爱，而是那个‘爱’的对象已经不在了。但我还是不能把他丢下。”这个叙述揭示的，不是依恋理论的失效，而是它的作用范围：依恋解释了“对他这个人的不离弃”，而照护者在此之外报告了一个更奇怪的推力——对“这个正在受苦的生命”的不离弃，即便这个生命的承载者已经不再是那个“他”。这个推力所对准的位置，是“邻舍”而非“配偶”——而“邻舍”这个范畴，正是解释劳动沉积制造的产物。

两组切割并不要求我们在依恋与未持之因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实际的照护行为可能是两者以不同比例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需要的只是在理论上确立：存在一种因果效能，它不在依恋的靶区内，却在照护行为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只要这个剩余效能在经验中真实存在且不可被依恋框架消解，未持之因就具有与依恋理论不可互相还原的指涉独立性。

五、未持之因的发生机制

未持之因的发生依赖两个过程在时间上的先后衔接：解释劳动的长期沉积制造了可被失持后释放的动力材料；意识持有的瓦解将这些材料从命题外壳中释放出来，使其能够在特定触发情境中以非持有的方式推动行动。这两个过程各有其独立的条件与边界，且二者之间的衔接必须满足一个严格的时间-结构配置——“深度持有后深度失持”——才能产生未持之因特有的因果效能。

5.1 沉积：解释劳动如何制造非命题性的行动倾向

任何一个要求成员承担沉重代价的价值系统，都必须配备一套持续的解释劳动。神学家、讲道者、灵修导师、社群叙事者、平信徒之间的日常交谈，共同编织着一张不断再生产“为什么这样做是值得的”的道理网络。解释劳动的显性功能是维持成员在意识层面对系统命令的认同——让成员能够向他人也向自己回答“我为什么做这个”。但本文关注的是它的隐性功能：制造非命题性的沉积物。

这一隐性功能的发生可以拆解为三个互相增强的层次。

第一层次：典范叙事在成员的感知结构中种植“情境-行动”的配对图式。反复听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不只是学到了一个道德教训；更重要的效应是，在感知结构中刻下了一个图式——路边受伤的人（特定面孔、特定姿势、特定空间位置）与“停下来”“弯腰”“拿出油和酒”（特定动作序列）之间的配对。这个图式不是命题性的信念——它不陈述“凡是在路边看见受伤的人都必须停下来”——而是一个感知与行动的倾向性联结：一个被多年叙事刻画过的感知结构，在面对一个倒在路边的人

时，会在意识的命题判断尚未完成之前，就已经将“停下来弯腰”推入了行动的预备态。

第二层次：仪式实践以身体在场的方式将特定行动序列铭刻为肌肉与情感的倾向。公祷时的跪下、圣餐中接过饼和杯的手势、团契分享中说出宽恕话语的喉咙震动——这些动作不是在表达先在的信念，而是在制造信念的身体基座。仪式实践不要求参与者在每一次跪下时都在意识中调取“跪下代表谦卑”的命题知识；它要求的是身体的在场与重复。通过这种重复，某些动作序列逐渐从“需要决定的行动”转化为“被情境触发的预备态”。

第三层次：社群的日常互动不断微调着成员的注意力方向。哪些情境是“需要回应”的，哪些人是可以“视而不见”的，这些判断往往不是通过明确的教导传递，而是通过无数微小互动的累积。一个在照护型社群中长期生活的人，其感知结构中那个“正在受苦的邻舍”的轮廓，被社群数十年间的日常互动铭刻得远比一个孤立个体更为清晰。

这三层沉积共同制造了一类特殊的动力材料：它不是需要意识权衡“要不要做”的命题，而是已经渗入身体与情感的、倾向于在特定触发下启动的预备态。这个预备态不是“信念”，不是“知识”，不是“习惯”——它是被一套特定伦理命令所定向的、身体化的情境-反应倾向。本文将这种动力材料称为“沉积倾向”：指通过典范叙事、仪式实践与社群互动而铭刻于感知结构中的、指向特定伦理行动的、无需经意识命题式调取的倾向预备态。

沉积机制的独立性是未持之因理论的一个关键支撑点。沉积的发生不要求成员在意识层面“相信”系统的解释。一个对系统教义持怀疑态度的人，只要他仍持续参与社群的仪式、聆听社群的叙事、嵌入社群的日常互动，他的感知结构仍然在被这些实践所沉积。也就是说，解释劳动制造沉积倾向的功能，独立于其维持意识认同的显性功能。解释可以失去说服力，但沉积可以不随之消失。

5.2 失持：当意识松开它曾经握住的解释

在沉积阶段的早期和中期，被制造出来的沉积倾向通常被意识的解释体系所包裹。成员会用自己的信念、教义知识或精神领悟，将那些正在体内形成的倾向解释掉——“我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坚持是出于信仰”“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意识的解释在此时发挥着双重功能：它既是动力倾向向行动转化的通道，也是动力倾向的监控者和审查者。

所谓监控，指意识持有状态会对每一个被沉积倾向推入的动作进行事后评估——这个动作符合教义吗？有什么属灵意义？是否偏离了正路？这种评估虽然在命题层面给行动提供了“说得通”的叙事，却也同时给行动施加了认知摩擦——每一个动作都要经过解释的过滤，才能被赋予合理性。在深度持有状态下，这种摩擦往往不被觉察，因为解释框架本身充满情感力量；但当解释框架开始因反复使用而疲软时，认知摩擦便逐渐暴露出来。

所谓审查，指意识会抑制那些不符合当前持有版本教义或自我叙事的行动冲动。一个持有“上帝必使我得胜”之解释的成员，可能会压制那些指向“默默承受”而非“积极争战”的沉积倾向，因为后者

与他的持有版本在命题层面不兼容。在这个意义上，意识的解释壳既是动力的输送管，也是动力的滤网。

失持的发生，就是这道滤网的结构性撤除。触发失持的路径可以有多种：个人苦难使旧解释丧失了情感说服力；理性反思使解释体系在认知层面瓦解；长期的日常磨损使解释的“新鲜感”消退。这些外部触发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失持过程也有一个内在的耗散机制，值得单独展开。

任何一种深度持有所依赖的解释框架——尤其是那些以“恩典”为核心话语的宗教诠释系统——都携带着一种内在的、无法被完全缝合的张力：恩典总是既被宣告为“够用的”，又被体验为“无法确认的”。信徒被教导要“凭信心不凭眼见”，但这个教导本身就制造了一条不断加宽的小口子：你越是认真地去“凭信心”，你就越敏感于“没有眼见”的事实。每一次你在困境中告诉自己“恩典够用”，你都同时激活了那个与它伴生的疑虑——“但万一不够呢？”这不是信仰薄弱者的专属挣扎；这恰恰是信仰最认真者的结构性处境，因为他们才是在最深的层面上与这个张力日夜对峙的人。

这就是意识的排气衰竭。意识对解释的握力，不仅来自解释内容本身是否可信，更来自意识维持这个握持动作所能动用的心理能量。深度持有要求意识持续地握住一套解释，不断用它来筛选、命中和归置日常经验中那些与解释不兼容的情感与事件。这个握持不是一个静态的认知状态，而是一个持续耗能的动作。当外部冲击（苦难、祛魅、社群支持衰减）叠加在内部耗散（恩典永远无法被经验确认满足）之上时，握持的能量被耗尽。此时发生的不是“我决定不再相信”——那仍然是意识握力的一个反向行使。发生的是：手还在那里，解释还在手中，但手已经没有力气再握紧了。解释不是被扔掉的；它是从疲极松开的手指间滑落的。

在这个裸露状态中，发生了一件反直觉的事情。失持不是推动力的消失——不是“既然我不信这套了，我就不再被它推动”。失持是推动力改变了它的运作通道。在持有状态中，沉积倾向要通过意识解释的审核才能转化为行动：信念激活解释，解释授权行动。在失持状态中，意识的审核站点被极简化了。触发情境——一个受苦者的面孔、一声邻舍的哭喊、一个熟悉的日常节奏——直接激活了沉积倾向，行动在意识还没来得及“决定”之前就已启动。事后意识才追上去，试图为那个已经被启动的行动补一个解释。这正是Posti记录的那些叙述者所描述的：“我仍然在用以前的话说，但它们拉不动我了。”那些话曾经是动力的唯一通道；现在它们只是一个事后追上的注释。

5.3 从持有到失持：未持之因释放的时间-结构配置

沉积与失持在时间上是先后相继的：沉积制造动力材料，失持释放这些材料的非持有效能。但生成未持之因所必需的，不是一个粗略的“先信后不信”，而是一个严格的时间-结构配置。这个配置由三个环节锁定。

其一，必须有一个深度持有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成员在意识层面全心认同系统的命令，主动投入仪式实践与社群生活，并长期用系统提供的解释框架来合理化自己的行动。“深度持有”不是一

个心理感受的形容词，而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标尺的结构位置：该成员在其生命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本文建议以五年为推定经验阈值，具体阈限应由经验研究确定），满足以下至少两项——（a）每日或每周以显著时长投入与系统要求一致的伦理实践（照护、施舍、探访）；（b）将自己行动的意义自觉建基于系统提供的核心解释框架，能够向他人给出与系统正统兼容的动机陈述；（c）深度嵌入相关社群（与会频率、成员身份认同、被社群同侪辨识为该群体的活跃成员）。这个标尺排除了那些“温和认同但从不用力”的成员——只有深度的、将整个生命结构都押在解释体系之上的持有，才能在持有瓦解之后留下足够密的沉积倾向。

其二，必须发生深度失持。“深度失持”的标尺是：曾经满足深度持有标准的成员，不再能在意识层面将沉积倾向用一套稳定的系统正统解释进行自我一致地整合，且达到这样的程度——（a）成员自述无法以其曾长期使用的核心解释框架为自己当前的行为提供真诚的动机陈述；（b）这种自述不是偶发的“今天没感觉”，而是在较长时期（本文建议以三年为推定经验阈值）内反复出现的稳定模式；（c）成员并未因此全面退出与系统要求一致的伦理实践。这个标尺排除了暂时的属灵低潮或轻微的教义怀疑——只有那种经历了意识维持力长期耗尽的深层裂变，才产生未持之因的释放条件。

其三，失持之后，沉积倾向必须仍有可被激活的触发情境。如果失持发生在与触发情境隔离的环境中——例如，一个曾经全身心投入社群照护的成员，在信仰瓦解后搬到了一个不再需要面对任何受苦他者的住处——那些沉积倾向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未被激活，因而从未成为未持之因。未持之因的释放，要求失持与触发情境的同时在场：意识不再握持解释，邻舍的受苦面孔仍在。由此引出一个重要的边界条件：沉积倾向的“半衰期”。在缺乏触发情境的条件下，沉积倾向是否会逐渐衰退？本文认为会，但具体的衰减曲线无法仅凭理论推断。如果失持后长期（例如十年以上）缺乏触发情境，照护者不再面对任何受苦他者，那些沉积倾向可能因长期未被激活而逐渐失去其被触发的阈下预备态，最终退化为纯粹的记忆痕迹——它还在那里，但已经不再能推人进入行动。这不是推翻未持之因理论的边界条件，而是标定了这个概念的适用区间：未持之因不是一个永久的因果状态，而是一个有其时间窗的、要求失持与触发情境持续耦合的残余效能。

这个配置——深度持有 → 深度失持 → 触发情境的持续在场——是未持之因区别于所有邻近概念的核心标记。默会知识不要求深度持有阶段。习惯不要求失持。惯习不要求在极限压力下依然保持定向。Berger的惯常化不要求区分“不再持有”之后那束残余效能的特定因果来源。未持之因不是这些概念的家族成员。它是那个此前从未被单独拎出来的辨别维度。

5.4 机制的操作性定义

至此，发生机制已完整呈现。在完成了沉积制造与失持释放的因果展开之后，未持之因的严格定义可以结算如下：价值系统通过长期的典范叙事、仪式实践与社群互动，在成员的感知结构与身体记忆中制造出指向特定伦理行动的沉积倾向；当系统提供的意识解释框架因内外因素的结构耗散而在成员意识层面瓦解之后，这些沉积倾向从被意识命题式审查所施加的过滤与摩擦中脱出，进而在受苦他者的具体面孔、身体节奏或空间配置等触发情境下，以无中介于意识决定的方式被激活为具体行动。未持之因指的不是沉积倾向本身，而是这束在持有瓦解后所释放的因果效能。为表述方便，上文有时以“未持之因”兼指沉积倾向与失持状态的具体组合配置，但其核心指涉始终是后者。

六、价值系统动力学的重建

6.1 解释劳动的隐性功能：制造可供失持后释放的动力材料

解释劳动——神学家的论著、讲道者的宣讲、灵修导师的辅导、社群叙事的代代相传——通常被理解为维持成员对系统命令的认同。它的合法性来自它能够回答“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是值得的、为什么这痛苦有意义、为什么这牺牲不是白白浪费。从本文的分析框架来看，这个显性功能只是解释劳动的一半工作。另一半工作是隐性的：它制造那批“可供失持后释放的动力材料”——沉积倾向。

这道隐线一旦被提出来，传统上对解释劳动的两种对立的评价——它是在传递真理，还是在编织幻觉——都被重新框架化了。在未持之因的分析框架内，解释是否为“真”并不是解释劳动的动力效能的前提。即使解释在认知层面被证伪（例如科学世界观对超自然回报信念的消解），或者在接受者生命的某个时刻完全失效，那些在解释劳动中被制造出来的沉积倾向，仍然可以以非持有的方式持续运作。这不是为虚假信仰辩护——这是承认一个经验事实的因果基础：一个人可以在不再相信任何神学论证之后，仍然被早年唱过的圣诗、做过的祷告、在团契中握住过的那双手所塑造。

这不是说解释劳动的内容无关紧要。相反，内容决定了沉积的取向——不同价值系统在成员身上沉积的是不同类型的倾向。一个以“公义”为定向的社群，沉淀在成员感知结构中的，是对不公情境更敏锐的反应倾向；一个以“怜悯”为定向的社群，沉淀的是对受苦他者更易触动的预备态。沉积不是中性的习惯养成——它是有伦理方向的塑造。这个方向来自系统命令的实际内容，而非来自某个普遍的结构。

6.2 代际接力：旧沉积如何成为新叙事的材料

在一个真实运转的价值系统中，沉积与失持不是单链的线性过程，而是跨代际的循环。上一代成员在失持后被沉积倾向推动的行动——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还能继续”的照护者——被下一代目击和记录。这些目击和记录，成为下一代人自己的典范叙事。他们听着上一代人的故事长大，这些故事在他们的感知结构中刻下新的“情境-行动”配对图式；他们在仪式中反复执行与上一代相同的动作序列；社群的日常互动继续打磨他们的注意力方向。

这就是未持之因的复制机制：沉积倾向本身不可直接传递——你不能把一个人的身体记忆移植给另一个人。但它可以通过“被目击的行动”转化为新的叙事与典范，重新进入下一代的沉积循环。上一代人的“不知道为什么但还是做了”，成为下一代人解释库中“有人曾这样”的叙事材料。这些材料在下一代人的深度持有阶段被内化；又将在他们自己的失持中重新释放。系统不是靠把解释一代代原封不动地传递下去而存活的——每个时代的解释都会有断裂、有失传、有翻译的走样。但沉积倾向通过每一代人新制造的沉积物，不断被重新供给。解释是易朽的；沉积是耐久的。

6.3 不同历史条件下沉积-失持配置的形态差异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解释劳动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型。心理学话语——从早期的道德治疗到当代的创伤疗愈和积极心理学——逐步取代传统神学话语，成为许多前基督教社群中成员理解自身行动的首选解释库。在这场转型中，发生了一个微妙却意义深远的质变。

传统恩典话语的核心特征，在于它的动力源被构造为一种不能、也不应在意识层面被充分确认的东西。无论是在保罗书信中的“够用的恩典”，还是在奥古斯丁那里的“单方面主权的赐予”，都携带着一种永远比接受者所意识到的更多的剩余物。信徒终其一生可以不断尝试在意识中“确认恩典的同在”，但这种确认永远会撞向一个无法完全闭合的缺口——你不知道恩典此刻是否真的够用，你只能信任它够用。这个结构性的缺口，不是信仰的失败，而是恩典话语内置的一个特征：它让意识在为动力提供解释时，反复碰壁。每一次碰壁都是一次微小的“排气”——意识被提醒，它无法完全握持它所依赖的那个动力源。经过足够多次的排气，意识维持那套解释的握力被缓慢削弱。这就是前面所描述的失持的内在耗散机制。

现代心理学的自我成长话语则在结构上沿着相反的方向运作。它把恩典的不可通约性翻译为可持有之物。自尊是可以被测量和提升的；创伤是可以被疗愈和闭合的；人生意义是可以被建构、调整和定期更新的。当照护者不再用“恩典够用”来解释自己的坚持，而代之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我成长为一个更有韧性的人”，解释的劳动就完成了从“不可持有”到“可持有”的转型。这个转型在大多数层面上是真实的进步——成员获得了清晰的自我理解和可控的疗愈步骤——但它在动力底层的后果是：意识对解释的握持力被空前加固。当一个成员可以在任何时候调用一套心理学框架来告诉自己“我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我获得了什么成长”时，意识维持解释所消耗的能量大幅降低了，

意识反复碰壁的过程被绕开了。以这种解释形态为基座的深度持有，不容易进入失持——不是因为它的解释更真，而是因为它的解释更“好用”：它们被设计成可以被定期更新、自行调整、永不耗竭的版本。

这不是一个“哪个时代更本真”的问题。本文不预设任何时间等级——不暗示前现代恩典论因某种本真性而更优越，也不诊断现代心理学因过度清晰而“堕落”。站在发生学的立场上，我们只问：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解释劳动制造了什么样态的沉积-失持配置？传统恩典话语的结构特征——意识反复碰壁——制造了一种长周期的沉积-失持配置：沉积缓慢，持有深厚，失持风险高，但一旦失持，残余效能的释放也更为持久。现代自我成长话语的结构特征——意识被持续加固——制造了一种短周期的沉积-持久配置：沉积快速，持有多面向，失持风险低，但在遭遇真正击穿解释极限的危机时，残余效能的储备或许不如前者深厚。这不是说一种配置比另一种更好，而是说不同配置的持久力库存，在不同的压力条件下各自有不同的强弱。这一分析的目的不是为特定历史形态辩护，而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特定历史转型点上，某些类型的行动持久性呈现出统计上的变化。

七、反驳与回应

7.1 与剩余快感还原论的对质

这是本文必须最严肃对待的对手。一种拉康派的反驳可以将Post所记录的照护者叙述完整收编：那些照护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在做，这种不知道本身恰恰是剩余快感的标准签名——主体恰恰在“不知道为什么”的缝隙中，享受了一种不被他者符号系统捕获的、无法被命名的快感剩余。在这个解读下，未持之因不但不是剩余快感的替代解释，反而是剩余快感的标准案例：它以宣称“此处无享乐”的方式，制造了最大的享乐。

要回应这一攻击，不能仅靠区分“行动者主观上是否感受到快感”——精神分析的基本操作就是不信任主观报告。必须引入一个更强的控制变量，这个变量是：在持续的追问和解释之后，行动者自述的裂缝是否能够被一个最终的无意识账本所闭合。

在剩余快感的逻辑中，裂缝是解释的起点，而非终点。分析师的工作，正是把“我不知道”翻译为“你是在用这种方式享乐”——这个翻译在理论上总是可能的，且分析师的翻译权威在理论结构中总是自足的。即便被分析者拒绝接受这个翻译，拒绝本身也可以被再翻译为阻抗——阻抗也是享乐的一种形态。这意味着剩余快感的解释框架具有一个闭合的免疫结构：任何现象——包括“无法解释”——都可以被回收为“快感”的另一种运作方式。

未持之因所揭示的则是一个不同的现象：在Post所记录的那部分照护者中，“我不知道”在反复追问后，不是被翻译为更深的原因，而是指向了一个空位。这不是阻抗，也不是压抑。阻抗的特征是主体在逼近某个无意识结构时会表现出情绪紧张、话题回避或防御性修辞。而这些照护者在谈到动

机时的典型表现是平静的困惑——他们愿意谈论，愿意尝试各种解释框架，甚至积极配合研究者的追问。但在所有解释都被尝试过之后，那个“还是我不知道”的残余仍然在那里。这不是分析尚未完成的证据，这是因果结构本身的特征：那块残余不具备命题形式——它从来就不在可以被任何解释（包括精神分析解释）陈述的范围内。

这就是分离线的操作化标记。如果未来有研究采用系统的精神分析方法对同一批受访者进行长期的分析干预，而分析结果能够在追踪期内使那类叙述困境得以闭合——即受访者最终能够接受一个无意识层面的解释并将其整合进自我叙事——则支持剩余快感解释。如果分析干预后，那类平静的困惑仍然作为一个无法被消解的残余而持续存在，则支持未持之因的判断。这个检验条件承认了精神分析在它自身的方法论范围内可能证明比未持之因更强的解释力，同时也为未持之因划出了一个精神分析无法回收的残余地带。

7.2 与宗教理性选择模型的对质

宗教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以Stark和Finke的“可信承诺”与“风险共担”框架为代表）提供了另一组有力的替代解释。在该框架内，照护者在回报不确定时仍坚持行动，可以被解释为一种高成本信号：高昂代价本身就是成员向社群（以及向自己）证明其信仰真诚性的机制。任何成员若因“上帝不再说话”而停止照护，将面临巨大的社会资本损失与认知失调成本。

这组解释的覆盖范围是真实的。许多照护者的确在“回报不确定”的情况下仍受到社群期待和沉没成本的约束。但Post所追踪的那类持续照护者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在事实上脱离了那个原本施加社会资本压力的社群。他们不再去教会，不再与从前的信仰同伴保持频繁联系。这意味着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社群制裁机制”——社会资本损失、同侪评价、身份危机——在他们身上已经失效。

如果他们的照护行为仅在社群压力仍然在场的时期被观察到，理性选择模型完全足以解释。但他们持续照护的事实，恰恰发生在社群压力撤除之后的阶段。这个时间差构成了一个可控的比较：如果理性选择模型是充分的，那么在脱离社群之后，照护行为应随社会资本约束的消失而同步衰减。如果它没有衰减，那就必须承认有一个不依赖于社会资本计算的动力维度在运作——那个维度，就是未持之因所指向的残余效能。

7.3 自我指涉：本文作为解释劳动的定位

如果未持之因的论证成立，那么这篇论文本身便是一项解释劳动——它试图为某个现象提供一套更精确的道理。如果它成功地被读者“持有”为“关于持久性的正确答案”，它是否当场背叛了未持之因最根本的特征？

这个指控必须被正面接纳。本文确实是一项解释劳动。它不可能、也不试图将自己豁免于自己的分析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必须陷入自相反驳的逻辑陷阱。关键在于区分概念本身的特性和

这个概念所指涉的对象。未持之因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其因果效能指的是在一个具体的行动者身上，经由长期实践沉积、经历失持后释放的那个过程。一篇学术论文无论是在论证“重力”还是“未持之因”，其自身的论证逻辑都不会与它所描述的那个自然或社会过程相混淆——除非这篇论文声称，读完这篇论文之后，读者将获得“未经持有即被推动”的能力，而这当然是荒谬的。本文的效用在别处：它提供一个可被研究者在田野中使用的辨别工具。当研究者面对Post所记录的那类叙述困境时，未持之因的概念可以帮助她识别出一段此前被“习惯”或“社会规范”编码所轻易抹去的因果过程。理论的价值不取决于它自身是否可被持有，而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帮助观察者在具体经验材料中，看到此前看不到的因果裂缝。

7.4 神经还原论挑战

如果未来的神经科学能够精确描述照护者被推动行动时的全部脑区活动，并证明这些神经过程与其他动机类型没有本质差异，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否崩塌？

不崩塌。但需正面处理随附性挑战。本文的立场是：承认意识现象随附于物理基础——每个意义层的变化，必然有某个物理层的变化与之对应。但这种随附性不意味着意义层的变量在本体论上可以被物理层变量消去。理由如下：即使神经科学能够事后完美描述“为什么这个人在这一刻递了水”的脑活动，它也无法在事前从两个拥有相似神经结构中的人中，预测出谁会持续照护、谁会在解释瓦解后停止。因为那个能做出区分的关键信息，不在脑结构中，而在两个人各自不同的解释劳动沉积史——他们听过什么样的故事、做过什么样的祷告、被谁以什么方式教导过、在哪些仪式中反复执行过哪些动作。这些信息是跨时间的意义交互在神经基座上累积出来的模式差异，而不是神经活动本身的参数差异。未持之因所命名的，正是这段不能被神经还原论捕获的信息差异的因果效力。

八、证伪条件与界限

一套理论若不能指明什么经验事实的成立将推翻它，就不是理论。以下证伪条件基于现有人口调查和比较研究在原则上可获取的数据设计。

条件一：来自宗教归属与长期照护行为的比较数据。如果在一个特定传统社群中，那些曾经历深度失持但仍持续从事照护行为的成员，其照护行为在失持发生后的第五年，与那些从未经历此类危机的成员相比，出现了同等比例的终止；且这一模式的终止率与一个同样经历了深刻认知打击但未经前期深度解释劳动沉积的对照群体没有显著差异——那么本文关于“深度持有后深度失持释放特定效能的沉积”的判断被削弱。

条件二：关于照护者叙述动机的长时段质性研究。如果在多种不同背景的长期照护者中，研究者进行多年追踪后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还能继续”这类叙述困境的出现概率，与照护时长、信仰投入程度或意义崩塌的严重程度之间没有系统性的正向关联，而是随机分布或与人格特质更相

关——那么本文所描述的这种特殊因果状态，作为可被经验识别的动机特征，即不成立。

条件三：关于解释劳动形态切换的长期效应。在那些已基本完成从传统恩典话语向心理学自我成长话语转型的社群中，若追踪研究显示，其成员在遭遇个人重大危机后，长期照护行为的维持率，与仍以传统恩典话语为主的社群没有显著差异——那么本文关于“不同解释劳动形态制造不同沉积-失持配置”的判断被推翻。也就是说，如果高度可持有的解释体系同样能产生与低可持有解释体系等量的非持有动力残余，那么本文的发生学便无法分辨两种解释劳动形态的真实差异。

条件四：关于沉积倾向的感知结构定位。如果未来的实验研究能够在对照条件下证明，那些在照护对象的个人同一性消失后仍持续稳定照护的照护者，其照护行为的维持仅依赖于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残余的情感附着（依恋框架），且移除二者之间残余的个人化互动（例如由护理人员完全接管身体接触类照护任务）后，照护者的“仍在做”随之消失——那么本文关于“未持之因的触发不附着于特定个体的个人同一性而附着于受苦邻舍的范畴”的判断被削弱。

以上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在严格的研究中被满足，本文的核心论证即失去经验基础。它仍可能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概念，但不再构成一个经得起实证检验的解释。

结论

本文从长期照护者叙述困境中结算出一个此前未被单独切出的辨别维度：未持之因。它回答的不是“人为什么会做某事”，而是“人在那些曾经让他做某事的理由都已消失之后，为什么还在做”——并且这个“还在做”不是无差别的惯性，而是仍然指向那个特定邻舍的定向推力。它的发生路径是一条被反复观察却从未被精确命名的因果链：解释劳动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不是仅仅在说服意识，更在身体记忆与感知结构中制造沉积——制造那些将来可以不再依赖意识握持、却仍在特定触发情境下推动行动的动力预备态。当意识终于耗尽了握持那套解释的力气，当恩典不再在祷告中说话，这些沉积倾向从解释壳中脱出，成为日常持守最后的暗流。

未持之因有它明确的界限。它不是永久的因果状态——在长期缺乏触发情境的条件下，沉积倾向会因不被激活而逐渐衰退。它的释放以深度持有为前提——一个从未用力握过那套解释的人，在握力耗尽时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滑落。它是对特定受苦他者之面孔的知觉-冲动预备态，不是对任何重复动作的中性习惯。它不依附于照护对象的个人同一性——这正是它与依恋理论之间的那条分离线：当照护对象已经不再能被识别为“那个我爱的人”时，依恋的靶区已空，而未持之因的触发条件——一个正在受苦的邻舍——仍在。

最后，本文给出一个实质较强的证伪条件。如果照护者在失持发生后的第五年，其行动维持率与从未被深度解释劳动沉积、却同样经历了意义打击的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那么本文的核心论证即失去经验基础。这个设在第五年的观察窗，就是未持之因的半衰期赌注。如果它过了，那些沉积倾向还在推人进入行动；如果没过去，它仍可能是有启发的概念，但不再是经得起检验的解释。

本文的分析没有为任何一种特定的解释劳动形态辩护。它不诊断现代心理学的“可持有化”是一种衰落；也不颂扬传统恩典话语的“不可通约性”为更本真的动力源。它只追踪动力形态在不同条件下的真实转换。在恩典话语中，动力库存的积累耗时漫长，依赖于意识反复碰壁所磨出的失持裂隙；在自我成长话语中，动力库存的更新周期更短，依赖于意识持续握持的可持有解释。前者在地表水蒸发后，仍有深层沉积层可以渗出一段时日的暗流；后者的持久力更多依赖于解释解释的持续补给。两种配置各有其压力条件下的不同表现。本文的任务不是替读者决定哪个更好；而是提供足够清晰的因果地图，让研究者可以在经验材料中认出一个此前被视为“习惯”或“社会规范残余”的现象，并且给它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新名字。

这恰恰是未持之因所描述的那个结构的特征：它不在任何人的意识持有之中，因此它不会与任何一套解释体系一起朽坏。它只是在那里，从每一次解释耗竭的裂缝里，从上一个把话说完的人的嘴唇合拢的瞬间，无声地溢出。

参考文献

-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 Bourdieu, P. (1980). *Le sens pratique*. Paris: Minuit.
- Derrida, J. (1991). *Donner le temps*. Paris: Galilée.
- Mauss, M. (1925). *Essai sur le d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Polanyi, M. (1958). *Personal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New York: Doubleday.
- Post, S. G. (2000). *The Moral Challenge of Alzheimer Disease: Ethical Issues from Diagnosis to Dying* (2n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ahlins, M. (1972). *Stone Age Economics*. Chicago: Aldine.
- Stark, R., & Finke, R. (2000).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Žižek, S.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